

日本政法考察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東遊日記彙編

王寶平 主編

日本政法考察記

劉雨珍 孫雪梅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政法考察記 / 王寶平主編; 劉雨珍 孫雪梅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

(晚清東游日記彙編)

ISBN 7—5325—3129—5

I. 日... II. ①王... ②劉... ③孫... III. ①政治制度 - 日本 - 近代 ②法制 - 日本 - 近代 IV. D731.3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11446 號

晚清東游日記彙編

日本政法考察記

劉雨珍 孫雪梅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31.875 插頁 5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200

ISBN 7—5325—3129—5

K·386 定價: 98.00 元

總序

王寶平

據考古發現，日本列島長期與大陸緊密相連，大約在一萬年以前才逐漸形成目前這種一水相隔的狀態。地緣的相近，決定了中日兩國必相往來，而文字的相親，極大地增加了交往的密度。自古以來，中國的載籍對日本以及中日間的交往可謂史不絕書，它們為我們研究古代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中日關係史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豐富史料。但是客觀地說，這些史料往往帶有中華文化中心的思想，含有不少獵奇、非科學的成份。這可謂中國之日本研究的第一階段。

有明一代，倭寇撓邊，警報不絕，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塗炭，朝廷統治受到威脅。抗倭鬥爭的需要促使一大批將領幕僚研究日本，從而產生了《日本考略》、《日本一鑿》、《日本考》等一系列研究日本的專著，形成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這是日本研究的第二階段。

明亡清興，邊患消除，天下太平，於是日本研究復趨平靜。這時期，通過長崎一隅，中日貿易頻繁，由此誕生了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東洋記》（一七三〇年）、童華的《長崎紀聞》（一七三五年）、汪鵬的《袖海篇》（一七六四年）等一批以日本長崎為背景的著作，（三）以反映中日貿易為中心是第三階段日本研究的特色。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走脫亞入歐之路。日本的變化引起了近鄰中國的關注，有關日本動靜的報導經常出現在報端。（三）初時，清廷對這「蕞爾小國」心存幻想，欲籠絡之為我所用。臺灣一役，日本一開始就訴諸武力，顯示出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急迫和露骨，朝野為之震驚。緊接着，炮擊江華島、吞併琉球等事件接踵發生，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迫使中國對之高度警惕。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日本研究漸次進入以防範為主要目的的第四階段。

這階段的前期，即光緒前十年誕生的著作以日本遊記爲主，從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東行日記》（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起，中經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記《使東述略》（附《使東雜詠》，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副使張斯桂的《使東詩錄》（同上）、王韜的《扶桑遊記》（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王之春的《談瀛錄》（同上）、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同上），一直到李筱圃的《日本紀遊》（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大多以日記和詩的形式記錄訪日觀感。這些遊記的作者，有的如王韜、李筱圃純粹爲了遊歷，但有的如王之春本身就是借觀光之名，行偵察之實。^{〔四〕}至於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外交官，他們雖沒有王之春那樣的直接使命，但中國一八七七年起對日遣使，除管束當地中國商民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藉探彼族動靜，冀可聯絡牽制，消弭後患」。^{〔五〕}因此，可以認爲他們寫的報告^{〔六〕}對朝野認識日本，進而作好防範準備，間接地起到了作用。這些遊記克服了傳統的日本研究者往往沒有親歷過日本的先天不足，是明治維新後中國人從日本傳回的第一批報導，標誌着摭拾傳說的歷史終結，一個面貌一新的研究日本的時代開始了。

光緒十年起，國人的日本研究又有了深化和發展。與浮光掠影的遊記相比，著作中多分設天文、地理、河渠、國紀、風俗、食貨、考工、兵制、職官、外交、政事、文學、藝文等類，對日本進行百科全書式的綜合考察。如姚文棟的《日本地理兵要》（十卷，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和《日本國志》（十卷，同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四十卷，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葉慶頤的《策鰲雜摭》（八卷，同上）、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四卷，同上）、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二卷，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以及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三十卷，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等。這類百科全書式的研究，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大量採擷日本的有關圖籍、統計報表。在今人看來，與其說它們是研究著作，不如說是資料集更爲貼切。時至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手捧這些著作，還不時爲其資料之翔實而心折，爲作者嘔心瀝血的搜尋精神而心動。正因如此，這時的著作往往卷帙不小，傅雲龍和黃遵憲的上述二書分別達三、四十卷之多即爲顯例。以光緒十年爲界，如果說此前的研究以遊歷（感受）爲主的話，那麼此後則長於記載（資料）。這種變化完全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由單一到綜合的一般規律，清楚地表明中國知識分子決心沉下心來全面、冷靜地認識日本，認真應付來自昔日朝貢之國發出的咄咄逼人的挑戰。

在上述第四階段的日本研究中，還誕生了一批較為特殊的著作——中日詩文唱酬集。與吳汝綸、薛福成、張裕釗並稱「曾門四子」的黎庶昌先後二度出任駐日公使，他在日六年間，主持或參加的中日文人唱酬盛會不可勝數，其中結集出版的就有《癸未重九讌集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戊子重九讌集編》（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己丑讌集續編》（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櫻雲臺讌集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庚寅讌集三編》（同上）等等。

在黎的身體力行下，使館其他隨員亦紛紛響應，大顯身手。其中，孫點為個中翹楚，他個人的唱酬集就有《嚶鳴館春風疊唱集》（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嚶鳴館疊唱餘聲集》（同上）、《嚶鳴館百疊集》（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等數種。

黎庶昌等人熱衷於詩文活動，除了有文人雅興的一面外，作為外交官，自有其良苦用心。在強鄰環伺，國力不濟之時，他欲以詩文廣交朋友，以人格魅力感染別人，從而團結、聯絡更多的日本友人，實現中日聯手抵禦西方列強東侵的外交目標。「大局自關吾輩事，好懷須向素心開」、「求友嚶鳴爭出谷，等閒鷗鷺（歐洲與俄羅斯——引者）漫驚猜」、「關心最是中東局」^{〔七〕}等詩句即為黎氏這種心跡的自然流露吧。

除了外交官外，這時期不少寓日文人也積極投入唱酬活動，《蓮塘唱和集續編》（小野湖山，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愛敬餘唱》（大槻磐溪編，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日本同人詩選》（陳鴻誥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扶桑驪唱集》（葉焯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等詩集中即留下他們的痕跡。他們與駐日使團一起，一官一民，互為補充，為增加中日間的互相信任，促進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八〕}

正當文人沉浸在詩文唱酬、觥籌交錯之中時，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戰爭不但摧毀了洋務派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也打破了黎庶昌等人孜孜以求的中日兩國唇齒相依、共禦西方列強的美好願望。從此，維繫了千餘年的中日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沉睡的雄獅開始具有了群體意義上的覺醒，一個以強敵為榜樣、尋求民族自強的時代到來了。我們姑且將這一時期的日本研究稱作第五階段。

這時的日本研究以考察記為主，如教育考察記有姚錫光的《東瀛學校舉概》（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朱綬的《東遊紀程》（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軍事考察記有張大鏞的《日本武學兵隊紀略》（同上）、丁鴻臣的《四川派赴東瀛

遊歷閱操日記》(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等,農工商考察記有潘學祖的《考察東瀛農工記》(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許炳榛的《乙巳考察日本礦務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劉學詢的《遊歷日本考察商務日記》(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政法考察記有劉庭春的《日本各政治機關參觀詳記》(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王儀通的《調查日本裁判監獄報告書》(同上)等。此外,綜合性考察記有謝紹佐的《東遊分類志要》(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楊道霖的《日本統計類表要論》(同上)等等。

與以前任何一個階段相比,第五階段的日本研究性質迥然不同,全面學習日本成了主旋律。在維新派眼中,這時的本從昔日的桃太郎一躍而成爲東方的巨人,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九)赴日考察風起雲湧。如果說第四階段開啓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日本研究熱潮的序幕,那麼,第五階段則是名副其實的高潮。研究的動機由被動的本能反應——防禦轉爲主動的虛心學習,研究者已從知識分子擴展至所有東渡考察者:官吏、文人、實業家和學生。對中華民族來說,研究日本再也 不是抽象的紙上談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亟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是一種書齋式研究,而是一種社會運動!

對於上述光緒以來中國人的日本研究著作,最早予以重視並進行蒐集和整理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先生,^(一〇)他根據這些著作多以「東遊日記」命名的特點,將它們稱之爲「東遊日記」。今天,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皮藏有他積畢生心血蒐集的數千種頗具特色的舊藏,其中,「東遊日記」達二二七種(含民國時期的七十七種),可謂澤被學人。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東遊日記」的名稱雖未必十全,却因其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大量東渡日本,間接吸收西方文明這一歷史特質而廣爲學界所接受,「東遊日記」遂成了晚清光緒年間至民國前期國人赴日考察、留學的日記、報告和研究著作的總稱。

迄今爲止,學界對留日學生作了大量細緻的調查研究,而對官吏的考察涉足較少。事實上,由於官吏身居官職,思想成熟,在留學生大量回國發揮作用之前,是他們先期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勿庸諱言,在某些東遊日記中,存在一些浮光掠影、議論膚淺、資料拼湊等弊病,但重要的不是敘述水平的高下,而是他們代表了一個敢於跨出國門,直接去國外感受新事物和新氣象的社會群體,開創了走出傳統思想的藩籬,面向世界的新風尚。這些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面對陌生的異域文明,經受的心靈沖擊程度未必相同,文化認同也不盡一致,但有一點一以貫之:筆叙日

本，意在中國，他們為謀求祖國自強自立的良苦用心躍然紙上。從甲午戰爭到今天，歷史已跨過一個漫長的時段。雖然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事實上我們面臨着與先人相同的一個課題：如何完成現代化事業。因此，這些東遊日記，不僅是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更是近代中國謀求整個社會形態和文化模式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留下的生動記錄，對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也具有客觀的借鑒意義。

中國自八十年代以來，鍾叔河、王曉秋、武安隆等先生對東遊日記進行了整理與研究，^(一)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將東遊日記作為主要研究課題之一，近年又有熊達雲、汪婉等留日博士分別對政法、教育考察記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二)這說明該課題正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其史料價值正在進一步得到認識。但是，東遊日記數量龐大，館藏分散，利用極為不便，有鑒於此，我們不揣冒昧，將數年來克服種種困難苦心蒐集的這些資料整理成編，名為《晚清東遊日記彙編》，公諸同道，以期為學界做些鋪墊性工作。本叢書教育考察記部份已由杭州大學出版社先行出版，^(三)綜合、軍事、政法、農工商考察記以及唱酬等專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續出。每種或輯數人為一卷，或收一人成一書，首冠前言、解題，後附索引，影印時力求保持原貌，個別模糊不清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技術處理。

東遊日記的蒐集與研究，先後列入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一九九八年度）以及住友財團的科研項目（一九九九年度），本叢書為其中間成果之一。

注 釋

(一)《長崎紀文》，一卷，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童華自序，乾隆中刊本。是書對中國銅商在長崎的貿易、日常生活等情況的描寫，可補其他同類文獻之不足。

(二)清前期還誕生了吳江翁廣平撰的《吾妻鏡補》（一名《日本國志》，三十卷，一八一四年自序）一書。這部著作雖非描述長崎貿易的專著，但在卷十三、十六、十七等處多次言及。詳見拙編《吾妻鏡補》——中國第一部日本通史，日本京都，朋友書店，一九九七年。

(三)如《申報》在創刊之年中頻頻刊登有關日本的消息：「日本使臣至花旗見國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日本地震」（四月初八日）、「東洋欲改服色」（四月初十日）、「（日本）博物院」（四月十五日）、「論東洋新造金小洋錢」（四月二十八日）、「論東洋人男女同浴」（四月二十九日）、「東洋改服色」（五月初一日）、「論東洋博物院事」（五月初八日）、「日本治度信息」（五月初八日）、「日本英國近事」（五月十四日）、「日本近事」（五月二十日）、「論東洋新鑄大小銀錢銅錢事」（五月二十一日）、「論日本通商事」（五月二十四日）等等，可謂

日本的一舉一動盡在觀察之中。

〔四〕王之春此行訪目的目的在曾任兵部侍郎的彭玉麟爲王著所撰的《談瀛錄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勢要害、風俗美惡、政治得失，則無由攻瑕擊隙，以制其死命；而又慮臨之以師旅則易啓爭端，重之以使節則反招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動聲色、直探巢穴、密訪周覽、洞悉霧情於胸臆者，久之難其選。王爵堂觀察閱命奮袂請行……」

〔五〕《直督李鴻章奏日使大久保抵瓊瑤約期撤兵並請遣使駐日本片》、《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卷八頁。

〔六〕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規定「東西洋出使各國大臣務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仍按月彙成一冊咨送」。《清同光間外交史料拾遺》，第五卷九頁。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一九九一年。

〔七〕黎庶昌：《庚寅謠集三編·題襟集》，四頁、五頁，一八九〇年駐日清使館序刊。

〔八〕參見拙文《晚清文人與日本——光緒年間寓日文人考》、《中日關係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北京市中日關係史學會合編，一九九八年八月。

〔九〕例如，張百熙等提出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規定：「各省辦理學堂員紳，宜先派出洋考察。……歐美各國，道遠費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則斷不可不到……」（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五三三至五三四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鄂督張飭湖北實缺州縣出洋遊歷博覽周諮札》命：「各該員刻日領咨起程，自備資斧，赴東遊歷，毋稍延緩。」（《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學務處呈覆遵議各州縣派人籌備公款遊歷日本以備充當學董辦法文》（《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對官紳遊歷作了非常具體的規定。

〔一〇〕實藤惠秀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了對東遊日記的研究。如《東遊日記研究序說附東遊日記目錄》（《日華學報》八二號，日華學會，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

〔一一〕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武安隆、劉玉敏：《嚴修東遊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一二〕熊達雲：《清末中國官民的日本視察》，日本甲府，山梨學院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八年。

〔一三〕呂順長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前 言

劉雨珍 孫雪梅

清末，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爲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統治，腐敗的清政府被迫推行所謂的新政。而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改革官制與刑律，預備立憲。因此，在晚清國人對日本的考察視野中，行政與司法佔據極大的比重。從遊歷者所留下的遊記、日記及考察報告等資料來看，除寬泛的一般考察外，在各專項考察中，政法考察類著作最多。^{〔一〕}這些著作的作者，有的是清廷自中央或地方派赴日本的官員，有的是地方督署遣派的遊歷士紳，其中不乏自備資斧的考察者，還有一些則是當時的留日學生。他們對日本行政與司法等所作的考察，爲清政府即將推行的新政提供了必要的參考。

一

一八六八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發展道路，逐漸成爲資本主義強國。而同時代的中國則國勢衰微，內憂外患，接連不斷。一八七四年日本悍然出兵臺灣；一八七五年進攻朝鮮；一八七九年又強佔琉球。日本的崛起開始引起中國駐日外交官員的關注，如首屆駐日參贊黃遵憲在一八七七年抵日後，經過不到兩年的仔細考察，在與日本友人開展廣泛交流的基礎上，於一八七九年撰成《日本雜事詩》二卷，以詩附注的形式對日本的歷史、社會、文化、風俗以及明治維新後的各項改革進行了廣泛的介紹。此後，黃遵憲繼續密切關注日本社會的變革與發展，並於一八八二年三月離開日本前夕，完成了名著《日本國志》的資料搜集及初稿編纂工作。《日本國志》本著「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

加詳備」(《凡例》)的方針，對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官制、法律等作了全面而系統的介紹，旨在通過詳細探索明治維新後日本走向近代化道路的具體歷程，為中國的改革和施政提供一部生動的參考教材。但由於作者隨即調任舊金山總領事，無暇修訂刊行。直至一八八七年，《日本國志》的修訂工作才得以完成，其正式刊行更是在甲午戰爭後的一八九五年底了。^[13]

由於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的迅速崛起並未引起清廷的足夠重視，加之明治政府採取嚴厲限制中國人遊歷日本內地的措施，因此赴日考察遊歷的國人寥寥無幾。一八八六年七月，經過清政府的長期交涉，明治政府終於決定向中國開放門戶，允許中國人赴日本內地旅行、視察。一八八七年，經光緒皇帝欽定，被選為外國遊歷使的兵部員外郎傅雲龍與刑部主事顧厚焜，奉命遊歷日本、美國、秘魯、古巴、巴西等國。十一月十六日(舊曆九月二十六日)，二人抵達長崎，開始了為期六個月的日本考察。二人先在東京考察了海軍、陸軍、大藏省、司法省以及學校、製造工廠、工場局廠、公園、船塢等，在外務大臣伊藤博文發給遊歷內地的護照後，又先後考察了靜岡、名古屋、琵琶湖、滋賀、京都、大阪、神戶等地。考察時二人作了具體分工，傅雲龍負責搜集日本的地理、歷史、風俗及舊事逸聞，顧厚焜則負責考察明治維新後所推行的各種新政。考察結束後，傅雲龍撰成《遊歷日本圖經》三十卷，顧厚焜撰成《日本新政考》二卷。《日本新政考》共分九部，其中卷一為洋務部、財用部、陸軍部、海軍部，卷二為考工部、治法部、紀年部、爵祿部、輿地部，下列共計七十三個細目，對於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官制、經濟、軍事、法律等作了較為系統的介紹。但是，誠如自叙中所言：「蓋慨西法之轉移國俗，何如此之速也！又慨是邦之輕棄成憲，何如此之易也！」作者對於明治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並非全面贊成，軍事、經濟方面改從西法，尚表理解，但對於政治典章方面的改革，依然抱有極大的疑慮：「若夫歲曆之推遷，守其舊則農民稱便，衣冠之制度，率其常則國體自存。日人乃好異矜奇，竟一變而無不變也，是誠何道也！抑亦思一姓相傳，歷世已一百二十二，歷年已二千五百四十八，一旦舉法度典章，一一棄若弁髮，是得謂是邦之福哉！」^[14]可見顧厚焜對於明治政府改革法度典章並不是完全持贊同態度。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甲午之戰，一向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竟然打敗了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清朝，令國人上下對其刮目相看。值此民族危亡之際，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發起了維新變法運動，號召學習日本，變法

圖強。一八九五年，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應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上書光緒皇帝，陳述變法的主張。在這次有名的「公車上書」中，康有為指出：「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能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四)在他看來，日本以一個小島之國，竟敢挑戰中華，其變法自強的經驗應該借鑒。一八九八年，他又將《日本變政考》上呈光緒皇帝，書中以大量篇幅對西方的議會制度和日本維新的具體過程與措施進行了介紹，同時還將維新前的日本與中國對照，認為「日本蕞爾三島，土地人民不能當中國十分之一」，但維新以後不數十年，日本却能文明大辟，政法大備，成為強國。「以日本之小，能更化則聚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五)康有為以日本的成功來證明變法之可行。他介紹說，日本明治維新，其做法雖多，不外乎如下幾條：「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認為，「我朝變法，但採鑒於日本，一切足已」。^(六)康有為建議：「彼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法之次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之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將發現於我神州大陸矣。」^(七)在此，康有為進一步闡明了其欲師法日本，並通過日本而學習西方的主張。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開始實行變法。然而，由於慈禧太后等頑固派的瘋狂反撲及維新派自身力量的軟弱，「戊戌變法」運動僅僅持續了一百零三天便告失敗。

然而，甲午一役確實也為中國人提供了一次重新認識日本的機會，誠如梁啟超所言：「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八)面對日本的崛起與中國的衰落，中國的有識之士痛感應積極學習西洋文化，以求存圖強。他們認為，「取法泰西，獲效最著者莫如日本」^(九)；赴日學習，不僅路近費省，而且文字相近，易於通曉。對中國來說，日本不僅是學習西洋文化的成功典範，更是一條輸入西洋文化的捷徑所在。

《辛丑條約》簽訂後，政治統治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日本為師，開始推行新政，進行所謂的改革，旨在求強自保。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清廷頒佈上諭，指出：「近數十年，積弊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變。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要求督撫以上重臣就「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因革當並，如何而國事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再行上

稟1. (10)

自此，國人對日本的關注日漸密切，赴日考察、學習其政治、法律制度的遊歷者也愈益增多，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東遊熱潮。自一九〇三年起，無論官派還是自請，不管公費還是自費，赴日人數猛增，一時竟如過江之鯽。具體而言，留學生人數以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六年爲多⁽¹⁾，而遊日官紳人數則以一九〇三年——一九〇七年爲多⁽²⁾。始自一九〇三年的東遊熱，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達到高潮。

總的來看，無論是公派還是自請，遊日者的派出機關一爲中央政府，一爲地方督署。當然，他們的遊歷考察得到了日本有關團體及友人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雖然其中不乏維護日本自身利益的動機，但客觀上却爲清末中國人的大舉東遊提供了方便。下面我們就分別從中央與地方兩個層面對當時國人考察日本政法的情況加以論述。

二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中央政府派遣的赴日考察政法的情形。

一九〇六年底，清政府派載澤、尚其亨、李盛鐸及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率團出洋考察憲政，「隨帶人員，分赴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³⁾次年一月，載澤率領的考察團抵達日本，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參觀了上下議院、公私立大學、小學校及兵營、機械廠、警察裁判所等近代設施，還聆聽了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金子堅太郎、穗積八束等一流政治家 and 憲法學者關於天皇大權、日本憲政、日本憲法等方面的講義，同時又與伊藤博文討論了憲法的制訂等問題，「以求立法之原理，與其沿革損益之宜」。⁽⁴⁾載澤的《考察政治日記》對於日本各種設施的視察記述極爲簡單，但對於穗積八束的憲法講義以及與伊藤博文的問答却記述得非常詳細。⁽⁵⁾五大臣在日本和歐美各自考察了將近七個月時間，回國後即奏請立憲。爲了更加深入地瞭解日本的憲法體制，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學部侍郎達壽率考察團赴日對其憲法進行調查，後來達壽因被任命爲理藩院左侍郎而被中途召回，調查工作由駐日公使李家駒接替進行。他們除參觀了內閣、樞密院、宮內省、內務

省、大藏省、司法省、文部省、警視廳、地方政府等設施外，還在伊東已代治子爵的安排下，由穗積八束、有賀長雄、清水澄、太田峰太郎等專家學者講授有關憲政方面的系統知識，如日本憲法史、比較憲法、議院法、司法、行政、財政等。尤其是有賀長雄博士，先後為考察團講述憲政長達一年之久，甚至還親自為五大臣起草了視察報告。^{二〇}

在清廷所派出使大臣之外，各部也積極派員赴日考察。如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四月至八月，巡警部員外郎舒鴻儀與同僚章蘭蓀奉派赴日，考察警政。他們將「學堂講錄、參觀日記、友朋對答之語、與所製贈圖表、隨時連綴」《自序》，編成《東瀛警察筆記》。其中卷一「講錄」為作者參照東京警察學堂聽講時，學堂理事所授《警察講錄》一卷，並參考教習所講，擇要編輯而成。卷二「問答」為作者在警視廳或警察署與日人黑柳重昌、島田文之助、新藤銀藏、植木武彦、室田景辰、田川誠作等人的問答記錄。卷三「圖表」包括警察官辦制服圖、監獄圖、警視廳分課表、採用巡查試驗表、留置犯人表、調查戶口表、盜難告訴表、遺失口頭届出表。卷四「日記」記載了作者五月初七抵達長崎，至同年八月廿八日回國間的所見所聞。然如作者所言：「除考查警察外，常參觀監獄、軍隊、學堂、工廠，參觀後歸而志之。（中略）至於個人之交際，其往來酬應之事，概從刪略。」主要還是以參觀考察日本監獄等近代設施的記錄為主。

此外，雷廷壽亦於該年八月，被巡警部派往日本考察警察制度，十二月歸國。作為考察期間的調查報告，雷廷壽編輯了《日本警察調查提綱》一書。全書共分憲法篇、命令篇、官制篇、許可權篇、任用篇、俸給篇、紀律篇、賞罰篇等八篇，對明治維新後日本警察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介紹和考察。

是年，法律修訂大臣沈家本奏派刑部候補郎中董康、刑部主事麥秩嚴赴日調查裁判、監獄事宜。為了使調查工作得以圓滿完成，還增派留日的法科大學學生熊垓幫助調查，奏派刑部員外郎王儀通協助進行資料的編輯與整理。此外，刑部候補員外郎熙楨與四川綦江縣知縣區天相自備資斧同往遊歷。董康等人自當年的四月起程東渡，至十二月份先後回國。在大半年的時間裏，他們或赴日本各處的裁判所及監獄詳細參觀，或於司法省及其監獄協會聽其講解。在對日本的裁判、監獄進行了認真的調查之後，董康等人指出：「方今力行新政，而監獄尤為內政外交最要之事。雖其中條目紛繁，驟難力臻美備，而締構之初，宜注意者，厥有四。」他們建議清政府應改建新式監獄、培養監獄官吏、頒佈監獄規則、編輯監獄統計。同

行的熙楨也提出了六條建議供政府參考。同時，熙楨還建議，有志於司法改革之人，如不能遠赴日本參觀，不妨就近赴天津學習，因為天津的監獄在仿倣日本進行改良之後，已為全國之首善。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十月，原民政部官員劉桴與曾在日本法政大學學習的好友張瀚溪、劉孝咳一同赴日考察，滯日三個月，自費入法政大學地方自治講習班聽講兩個月。其間主要學習以下七類科目：聽清水澄主講憲法，聽黑澤久次郎主講府縣郡制，聽吉村原太郎主講市町村制，聽島田鐵吉主講戶籍法，聽工藤重義主講選舉法，聽松浦鎮次郎主講教育行政，聽小濱松次郎主講警察行政。與此同時，作者還遊歷了司法省、巢鴨監獄等東京及其附近的許多地方。作者在其所著的《蜃洲遊記》中，在介紹日本現狀的同時，還以附注的形式對一些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特別是其最後部分，作者在介紹了日本明治維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後，對於中國存在的各種弊病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and 探討，指出中國落後的病源在於：一、機關不備；二、人材不足；三、官場習氣太重，流品太雜；並對此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如針對機關不備之弊病，作者提出需採取六項措施：第一、改官制；第二、開國會；第三、開省會；第四、舉行地方自治；第五、遍設巡警；第六、遍設地方裁判所。針對人材不足的現象，作者認為必須：第一、培（養）法政人材；第二、培（養）各項專門實業人材；第三、力籌辦教育普及。又如作者認為，要改革官場習氣太重的弊病，必須採取如下措施：第一、普通考驗（無論京官外官，實缺候補，一切由欽派通曉新政大臣，分類切實考驗）；第二、分發考驗（專考驗新分發人員）；第三、省服冠；第四、省應酬；第五、省儉從；第六、免兼差；第七、免供張（外省州縣，凡遇大員過境，上司出巡，供億之費，往往不貲，今宜一律禁絕）。^{（二七）}這些都是作者通過親身赴日考察，對當時政府所推行的新政而提出的有益建議。

三

與中央政府遙相呼應，各地方督署爲了給各自的地方改革尋找範本、培養人才，也紛紛派員赴日考察學習，其所派人員總數遠遠超過了中央政府。

如一九〇三年，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受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委派，赴日考察大阪府監獄習藝等事宜。第二年，袁世凱又派其赴日。此次凌福彭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從沿革、制度、建築樣式、經費四個方面，對日本的監獄進行了考察。這種經歷，為凌福彭日後在天津開展司法改良提供了有益的幫助。

隨著新政的實施，受過新式教育的人材益發不敷為用，地方固陋的風氣與閉塞的民智的影響亦愈加明顯。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一些地方政府一方面繼續選派人員赴日留學，一方面派遣官紳出洋遊歷。如一九〇五年，袁世凱制定了遣派官紳出洋遊歷的辦法（《遣派官紳出洋遊歷辦法片》）。其中對派遣官員規定：「實缺州縣人員，除到任已久，未便令離職守外，其餘新選新補各員，未到任以前，酌給津貼，先赴日本遊歷三個月。參觀行政、司法各署及學校實業大概情形，期滿回國，然後飭赴新任，並責令呈驗日記以徵心得，數年以後，出洋之地方官日見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而選派紳士時則規定：「各屬公舉品端學粹之紳，咨送日本遊歷四月，應需經費有取諸學款者，有另行籌備者，每州縣至少須送一人，選派護送員、譯員隨同東渡。」該《辦法》最後明確指出：「方今時局更新，惟有上下一心，博採鄰邦之良法，此項官紳遊歷為目前行政改良之漸，即將來地方自治之基。」¹²⁸由此可見，袁世凱對官紳合作，共圖發展的重要性及學習日本的必要性已有較為充分的認識。

由於以直隸省政府與地方部門分別籌資的方式進行派遣，加之上述《辦法》對官紳遊歷所作的硬性規定，因而導致了直隸省人士的紛紛東渡，一時間竟成相擁於途之勢。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以知縣名義赴日的直隸省官員，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的《外國官民本邦及鮮滿視察雜件》（清國之部）中，有名可查者就有四十多人¹²⁹。他們分別來自保定、撫寧、西寧、欒城、邢臺、博野、清豐、無極、高邑、趙州、寧津、鉅鹿、滿城、廣昌、寧晉、容城、任丘、遷安、柏鄉、曲周等府、州、縣，分佈範圍不可謂不廣。一九〇七年，為適應籌備地方自治的需要，直隸又選派士紳分三期赴日考察地方自治¹³⁰。當然，在公派之外，尚有許多人「自備資斧」前往日本考察或留學。如嚴修一九〇二年八月第一次赴日考察時即為自費，陳振武、王毓銳、范潤書等人亦是以自費留日。大規模地公費派遣與不斷地自費前往相結合，遂使直隸成為當時東遊人數較多的省份之一。自一九〇五年六月至九月，直隸在短短四個月的時間裏，先後派了二百多人東遊。如此大規模的赴日遊歷，當時在

全國並不多見。^(二二)

日本之行對官紳們觸動頗大。一九〇五年六月，直隸鹽山縣知縣段獻增等十人同赴日本考察行政機關及學校制度。這十人均為實任知縣。在三個月的時間裏，他們在東京參觀了司法省、巢鴨監獄、市谷新舊監獄等四十餘處。然後又赴關西地區，在大阪與神戶參觀了縣廳、市役所等十餘處。一九〇五年七月赴日的直隸正定府欒城縣知縣劉瑞璘在其所著的《東瀛考政錄》中記載說：「日本衙署，仿照西式。局長之室，與大臣之室，均相毗連，有事可以立刻相商，不似中國深居簡出，屢謁不見。親王大臣，及地方官儀仗虛文，一切掃除。雖一等公爵、陸海軍大將升塔上馬，過輪船、登火車，不用僕從扶掖，謂己非痿痺，何必事事須人。與平民語，和平溫厚，故民無不達之情。」^(二三)對比之下，中日行政方式之落差可見一斑。

日本之行還使官紳們受到許多啓發。如一九〇六年赴日的直隸鉅鹿縣知縣涂福田在三個月的日本考察結束後，在其所著的《東瀛見知錄》一書的最後寫道：「雖然一見勝於百聞，千慮必有一得。吾師不遠，對鑒易明。因就日本所行之有效，為我直隸所急宜仿辦者，隨事記錄，約得十章。」這十條建議分別是：（一）津保宜設演說練習所也。（二）津保宜設農蠶實驗場也。（三）津保宜設森林水利專局也。（四）初等小學宜兼收女生也。（五）學校宜用通學法也。（六）各縣宜有銀行支店也。（七）各縣宜一律改良監獄，令罪犯習藝也。（八）州縣宜選正紳數人為名譽職員，略仿參事會之制也。（九）各縣於四鄉創辦巡警，宜練鄉團以為輔助也。（十）許州縣就地方起公債也。^(二四)

一九〇七年，為適應籌備地方自治的需要，直隸又選派士紳分三期赴日考察地方自治。據一九〇八年隨第三期士紳團赴日的直隸永平府盧龍縣舉人王三讓記載，考察團一行先於政法大學上課聽講。所學內容有選舉法、市町村制、戶籍法、憲法、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府縣郡制。兩個月的學習結束後，他們又赴茨城縣參觀。所觀之處有茨城縣監獄、水戶地方裁判所及區裁判所、茨城縣廳及東茨城郡吉田村役場。

此外，當時在日學習的留學生對日本的政法亦頗為留意。他們中的一些人憑藉所學的專業知識，利用課暇或畢業後滯留的時間，對日本的行政與司法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其中，來自直隸的留學生劉庭春、孟傳琴、趙世清、李鳴鹿及湖北留學生羅邦俊、山西留學生續思文、山東留學生唐文源、江蘇留學生王皋，自警察學校畢業後，先後利用數月的時間，對日本的各